



从《大公报》报道看红军长征

李秀云 王子姣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长征期间,国民党当局封锁红军消息,长征的真实情况很少被一般读者所了解。天津《大公报》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持续记录了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大公报》刊载了六百余篇涉及长征的报道,涵盖消息、评论、通讯、游记、访谈等多种体裁,留存了言论界对红军长征的观察、分析与预判。《大公报》的报道,打开了一扇透视长征的窗口。

一、《大公报》完整呈现红军的战略转移轨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5日,《大公报》刊发广州、厦门专电,明确报道中央红军于10月21日向赣南突围,与国民党南路军在安远激战的行动。10月30日,通讯《朱毛大举突围 南路一度激战》报道中央红军向信丰、南康方向冲出封锁线的悲壮场景。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大公报》持续报道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强渡乌江、进驻遵义、于川黔边赤水一带回旋、渡金沙江、过大渡河,从赣南挺进川西的情况。

《大公报》对其他各路红军的长征情况也给予关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征后,《大公报》持续报道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一带的行动情况。1935年8月12日,报道该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陇南,“冀与朱毛徐等合股”的情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大公报》发表张季鸾的旅行通讯《川黔之行》,翔实记载国民党军队战败,红四方面军胜利渡江的情形。1935年5月,《大公报》持续追踪红四方面军西进茂县、理番等地,控制岷江两岸的动向。《大公报》自1935年11月28日起,持续报道红二、红六军团自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经湖南、贵州、云南,横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长征轨迹。

《大公报》的电讯,大多来自国民党的“中央社”,着力彰显国民党剿灭红军的战功。《大公报》未被误导,而是结合各地专电与特派员通讯,综合报道各路红军的长征情况。中央社电讯宣称已“击溃”红二十五军并且“肃清在即”,《大公报》发表社评《论陕乱》,直言红二十五军“迄未扑灭”。张季鸾的《川黔之行》指出,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的势力“还要大一点”。《大公报》成都特派记者发回的专电指出,中央红军“以数万之众,结果只

剩六七千人”。中央社宣称,最晚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做最后的挣扎,《大公报》于1936年1月28日刊发短评指出,该路红军“进窥贵阳不止一次”,可以证明“迄今还有相当力量”。

《大公报》详细回溯红军长征的关键战事,深入分析红军长征的战略意图。1935年1月16日、17日,《西南匪祸之观察》根据红军行军路线推测其兵力部署,指出:中央红军从赣南到黔北的行军路线与此前红六军团“几乎如出一辙”,因此,红六军团为“前锋”,中央红军为“后续主力”。1935年6月21日,《朱毛窜渡大渡河之经过》介绍了红军利用川军刘文辉部与当地土司的矛盾,争取当地人备船相助的情况,并分析红军渡天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行了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民族政策。

二、《大公报》积极研判红军会师后的局势变化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8日,《大公报》发表成都特派记者汪松年的《川西剿匪军事之形势》,推测红军只是利用四川金川、小金之险阻作暂时休整,其最终意图是北入甘青,“打通国际路线”,寻求苏联的帮助。

1935年7月至9月,《大公报》发表了二十二篇关于陕北红军发展态势及红二十五军在陕北行动情况的报道。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报纸中知晓陕甘苏区蓬勃发展的情况,决定北上与西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合。马文瑞等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回忆录与张闻天等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皆指出,《大公报》的报道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

1935年9月16日,首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1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整编为红十五军团。1935年10月15日,社评《再论陕甘军事》指出,红二十五军自延安向西南移动,“显为迎毛泽东”“陕北陇东,已成一个战线”,预判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合的战略布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并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5年11月7日,《大公报》刊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访谈,澄清外界关于

红军全部入陕的传闻,指出:到达陕北会师的仅为毛泽东、彭德怀所率五千余人,红四方面军主力仍据川西北懋功、丹巴一带。1936年7月25日,《大公报》报道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已于四川甘孜会师,正分路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情况。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宁夏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0月19日,《大公报》报道“徐毛朱萧贺合股”并“在会宁之马营”召开庆祝大会的情况。10月至12月,《大公报》连载特派记者的旅行通讯《陕北收复赤区视察记》,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各县的活动情况。12月3日、4日,《大公报》刊出《由绥德到瓦窑堡》,叙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中央机关的过程。12月17日、18日,《大公报》刊载《陕北共党发生经过》,系统梳理1923年至1936年陕北共产党发展与建立政权的过程。

三、范长江的旅行通讯深化了《大公报》的长征报道

1935年5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天津出发,溯长江抵达成都,7月14日开始西北采访。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了二十一篇旅行通讯,其中有十一篇涉及红军长征。他途经的江油、平武、松潘、岷县、平凉、庆阳、天水等地,与红军的长征路线多处重合。7月19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第一篇涉及长征的通讯《成都观艰了》,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的局势。《大公报》于9月13日、14日刊出范长江基于实地采访写作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篇通讯首次在国统区公开使用“红军”称谓,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范长江基于实地考察,综合政治、军事形势与地理状况,深入分析红军战略。《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逐一剖析红军北上的五条可能路径,判断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进一步分析红军未来根据地的选址必有三条



件,即可直接获得苏俄接济,可战可守不受环攻,经济富厚可以自给,据此判断红军将进入河西走廊。

范长江深刻呈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种种斗争。人与自然的搏斗最残酷,《从瑞金到陕北——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以长征亲历者的口吻讲述草地“下脚即陷一二尺”,夹金山“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的情况。《红军之分裂》细致呈现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白龙江边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之争。《陕北甘东边境上》记录了彭德怀集结五千饥疲之师反攻,使追击军“进退失据”的情况,尽显长征的复杂性以及红军的坚韧。

1936年1月,《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指出,“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了”,精准概括了长征令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意义。

结语

从1934年10月25日至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没有受制于时代局限,在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上持续报道长征,并公开用红军代替了“共匪”“赤匪”等称呼。特派记者范长江的实地考察通讯,理性分析红军的发展根基与战略抉择,还原红军长征的复杂历史征程,有效提升了《大公报》对红军长征报道的真实性、思想性。《大公报》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完整呈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赣南突围到三军会师的壮阔图景,也为中央红军决定长征落脚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其历史意义清晰可见。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研究(1903—2025)》(25AXW004)的研究成果】



从亲历者黄镇速写看红军长征

祁小龙 孙紫雨

以看到一位亲历者眼中的长征。

一、长征的整体图景:从于都河到哈达铺

黄镇的速写并非彼此孤立的画作,而是伴随红军行军不断生成的视觉记录。25幅作品合在一起,呈现的是一幅亲历者眼中的长征整体图景。它不是地图上一条抽象的路线,而是由一个个具体地点、一次次具体行动连缀起来的,不断向西、向北延伸的长征行程。

《星夜渡过雩都河》描绘长征出发时的夜渡场景,星夜、渡口、队伍,构成长征视觉叙事的起点;《遵义大捷》记录遵义战役后的胜利节点;《安顺场》《泸定桥》将画面推进至抢渡大渡河的险境;《翻夹金山》表现出翻越雪山的艰难;《背干粮过草地》《草地行军》则把行军空间推进到茫茫草地;《到了岷县哈达铺》呈现出长征转向新阶段的地理与心理节点。随着行军空间的不断转换,黄镇的视觉记录也逐渐延展,不同地域与历史事件次第进入画面,共同构成一幅与长征进程相伴而生的历史图景。

黄镇的画笔并不局限于军事行动本身。《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董振堂同志》留下红军人物的具体形象;《贵州苗家女》《川滇边干人之家》《彝族向导》《红军彝族游击队》《在藏族的村寨里》,将沿途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纳入画面。黄镇的画笔既记录红军走到哪里,又记录一路“遇见什么人、进入怎样的社会”。通过这样具体的画面,黄镇勾勒出了长征的整体图景。

二、长征的生命体验:背粮、宿营、磨青稞

黄镇速写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保存了宏大叙事中的生命体验。军事史通常以“战役—路线”为骨架构建长征的基本叙事,黄镇则提供了另一种进入历史的视角:普通战士的负重、饮食、宿营、疲劳与坚持。

《背干粮过草地》中,战士肩背粮袋、持枪前行,前倾的

身体将负重与跋涉之感鲜明呈现;《草地宿营》描绘行军途中战士们在茫茫草地露营的情景;《草叶代烟》则捕捉了物资匮乏条件下战士以草叶代替烟草的生活细节。这里没有重大战役,却将长征途中个体承受的饥饿、严寒、负重与疲惫生动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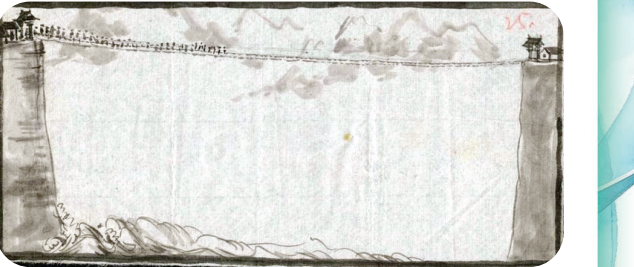
黄镇进一步将视线聚焦在日常生活与具体的生活器具。《三种锅》没有人物和战斗,只描绘行军途中所用的不同形制的锅具;《磨青稞》记录粮食加工的方式、动作;《烤饼》则呈现了食物制作的场景。锅、青稞和饼,看似寻常之物,但在物资极度贫乏的长征途中,却关系着战士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这些普通器物与劳动过程跃然纸上,使饮食、炊事等长期处于战争叙事边缘的生活内容获得了可见的形态。

这种生命体验,还体现在红军同严酷自然环境的顽强抗争之中。《翻夹金山》中,巨大的山体与行进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人的渺小反衬出雪山环境的严酷;《草地行军》则把人物置于广阔而难以辨识道路的草地之中,雪山、草地从长征路线上的地理名词,成为人的身体必须直接面对和穿越的生存空间;《下雪山的喜悦》又记录红军越过险境后的情绪变化,艰苦行军之外的人物心理进入了视觉记录。

黄镇以亲历者的眼光,把身体体验推向极致,用细节再现了普通战士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正是身体、器物、环境这些具象化的呈现,使宏大的长征落地到个体的生命体验之中,也为我们切实理解长征的艰难提供了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三、长征的精神力量:信念、勇毅与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黄镇的画作,为我们理解长征精神如何落实于行动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材料。



《泸定桥》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击,迅速歼灭守桥之敌。黄镇以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为主体,桥下激流奔腾,红军战士沿高悬的铁索前进,以简练的构图突出泸定桥之高、之险以及战斗的紧张。

25幅速写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风貌。这些在长征实践中淬炼而成的信念、意志与品格,共同构成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底色。《星夜渡过雩都河》呈现了红军在前路未明时毅然出发、坚定前行的选择。《到了岷县哈达铺》记录了历经艰难转战,方向渐明、信心愈坚的理想信念。《遵义大捷》《安顺场》《泸定桥》展现了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翻夹金山》《背干粮过草地》《草地行军》《草地宿营》彰显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下雪山的喜悦》《草叶代烟》表现红军战士身处逆境仍然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贵州苗家女》《彝族向导》《红军彝族游击队》《在藏族的村寨里》等作品则体现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各族人民的政治品格。

九十载岁月流转,画中所见已成历史,但贯穿其中的信念与力量并未远去,留在纸上的线条依然让人感受到那段征程的艰苦卓绝。重读黄镇的速写,正是在历史的细节中感知长征,在新时代赓续伟大的长征精神。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星夜渡过雩都河》

于都河是贡江在江西于都段的别称,是红军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英勇而悲壮的远征。

黄镇,将军、外交家、艺术家,190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1925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后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随部队改编进入红五军团,因绘画专长从事宣传文化工作。长征途中,黄镇曾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战斗,开展宣传工作。黄镇曾回忆,“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长征途中画过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张”。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画》原本收录25幅,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编订、更名为《长征画集》时,因两幅《草叶代烟》题材相近,经征求作者意见删去其一。201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重新出版《长征画集》,恢复《草叶代烟(二)》,25幅作品的原貌得以呈现。原稿的发现还纠正了一处题名讹误,长期被称作《过湘江》的第二幅作品,原题为《星夜渡过雩都河》,记录的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夜渡于都河(1957年,因“雩”字生僻,“雩都”改为“于都”)的场景。在影像资料匮乏的时代,透过黄镇的25幅速写,我们可